构筑优势 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挑战

章玉贵

三年前，当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前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时，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转移国际社会关于金融体系改革视线的一种战术安排。然而，近年来的情况表明美国这次是来真的。美国一方面继续借助中国之力稳定经济基本面，另一方面通过发动新产业革命，力图重新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而美国财经领袖也决定改变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偏好。

美国深知，过去那种过度追求金融产业发展，并依靠美元本位和全球化红利的模式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尤其是随着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增强后，放弃“金融巫术”偏好，重视实体产业和出口，才能扭转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颓势。的确，金融业过度发展负面效应非常强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则可以在较长产业链上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尤其有利于提高就业率。

美国布局经济转型的显著标志之一，便是深耕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从历史经验看，经济最困难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新技术和新产业常常出现。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假如上述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美国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产业体系。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被中国超越之后，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保持领先优势，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意图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而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有可能使得美国再次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制高点。

随着中国成本优势的削弱，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显现。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2002年~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3%和41%。在新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未来五年，最有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行业。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70%，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年均消费额为2万亿美元。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惊人的生产能力。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为19.8%，领先美国0.4个百分点。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

美国近来的一系列经济动作正是基于锻造美国经济竞争力战略考虑，如果美国在重整实体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成功地通过美元的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假如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针对中国筑起新的经济高墙；届时中国不仅难以与美国展开平等经济竞争，而且将失去原先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必须在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政策配套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技术创新积极性，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成产业化，最终打造一批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刺激国内消费 要从根本入手

周子勋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稳增长”的关键期，且在投资受到约束、外需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部委正就消费相关的若干领域密集摸底，并就相关鼓励政策的思路进行可行性论证和效果评估。综合各种情况看，促消费新政年内将密集出台，而且会更有力度、更注重实效。

消费内需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笔者查阅2000年~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多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率基本在50%~60%之间，远远低于同期世界上许多国家，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60%，比印度的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比日本的消费率低1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的消费率还呈下降趋势。2000年~2005年期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平均每年降低2个百分点。到2005年，消费只占到了GDP的52%。2006年，我国消费率为50%，2007年降至49.5%，2010年进一步降至46.6%。“十一五”结束时，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占的比重下滑到了35%。而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红火，不过是最近十来年的事。即便在这两个行业最火热的时期，也没能扭转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数据告诉我们，内需不振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存在。

消费率长期低迷，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家庭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的结果，是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由收入与财富水平决定的，离开收入增长，刺激消费只是空谈。

其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我们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目前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者对基尼系数的估算出现多样化趋势，对2011年我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不乏0.5左右的估值。值得关注的是，以往，我们一直把关注点放在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上，其实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很大。8月2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将农户家庭收入由高到低递减排序，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差距有10倍之多。

第三，扭曲的资金价格造成投资过度。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积极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偏低的利率水平乃至实际负利率，是在侵蚀储蓄者的利益，补贴低效投资，最终造成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度的局面。

当然，还有观点认为，信用消费发展不充分也是我国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总额占GDP70%以上，其中信用消费占消费总额三分之二以上；而我国2010年消费总额仅占GDP的38%左右，其中信用消费仅占消费总额的12%。这说明我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表示，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等制约消费的长期性因素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支持信用消费发展应成为当前扩大即期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我们必须清楚，信用扩张、信用消费的基础必然要以国民收入和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作为支撑，否则人们会谨慎有加，对举债消费缺乏热情。

因此，要从根本上启动内需、促进消费，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进行彻底的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因为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加快推进城乡包括教育、医疗等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还可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奠定重要基础。三是调整资金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才能提高，内需增长方能可期。

焦点评论

预防地方投资大跃进负面效果

江德斌

近期，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对此，有分析人士担忧新一轮投资竞赛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不能真正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三年来首次跌破8%，中央把“稳增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预期中的“4万亿2.0版”并未出台。而在“稳增长”的发展基调下，各地纷纷出台大手笔投资规划，取代了以往中央投资的主角地位，逐步形成地方性的“4万亿2.0版”。在中央政府默许的情况下，各地投资总规模迅速突破7万亿元，一场轰轰烈烈的地方投资“大跃进”即将上演。

2008年中央推出的4万亿投资，虽缓解了金融海啸造成的经济衰退影响，在出口与消费陷入困境之时，依靠巨额投资的拉动效应，促使经济重拾高增长态势，但亦因此留下重大隐患。由于财政资金压力过大，无法支撑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最终依赖货币增发和银行贷款，导致地方融资平台负债一度高达10.7万亿元，并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的后果。如果这次地方政府的投资“大跃进”得以成行，那么可以想见，未来将重复4万亿的悲剧，催生出更大的债务危机。

从各地公布的规划来看，各地依然是想靠投资收获政绩成果，渡过眼前的经济下行难关。与之前的4万亿投资不同的是，现在财政与国企均无钱可投，银行也受困于贷款风险，不敢再次大规模放款。于是各地纷纷将目光转向民间资本，出台各种鼓励性政策，试图将投资增长的筹码押注其上。

但是，在各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尚未彻底放开，对私有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有多少民间资本敢冒险试水？更何况，此前各地上演过的“国进民退”的负面效果至今未能彻底消除，民间资本害怕再次被套牢。无论是法律还是现实操作中，地方政府均缺乏对资本和产权的足够尊重，往往将其视为博取政绩的棋子，这种态度也令民间资本缺乏大规模进入的勇气。

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规划，表面上看是为了配合中央“稳增长”目标，但由于其冲动式投资计划缺乏充分的论证，最终投资效率难以保证，甚至可能再次推升产能过剩风险。因此，面对经济下行趋势，需要遏制住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须知“稳增长”不能靠大规模投资，应从减税、创新、产业升级、改善民生等多方面入手，将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放在重要位置上，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模式。

浙江销售过期奶，生产时间被篡改。
蒙牛频频曝丑闻，顾客屡屡受伤害。
金钱至上很可耻，诚信落空太悲哀。
严刑峻法要启动，食品安全系国脉。

ICLONG/图
孙勇/诗

各地工资“竞争”是一个积极现象

冯海宁

根据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媒体统计发现，目前全国22个省会城市和四大直辖市已经公布了2011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广州以57473元居首，北京56061元排名第二，南京则以54713元排名第三。

尽管“人均工资”经常遭遇“被增长”的质疑，但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收入水平。以媒体制作的这个“收入排行榜”为例，广州人均收入居首，不仅与广州经济发展较快有关，大概也与广州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有关。可以说，工资水平是经济水平与政策力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显然，把各地工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就有了“竞争”的味道。人均工资排在前列的城市，应该说相关负责人脸上很有光，因为工资增长纳入了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提高收入水平也是各地官员挂在嘴边上的话，而且目前舆论对工资水平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注。

当然，也不排除各地在制定工资政策时有一种竞争的意识。尽管各地经济基础不一样，但在制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时很有可能互相参照，在增长幅度上暗地里展开竞争。同时，还可以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与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方面进行竞争。

不管是无意的竞争还是有意的竞争，这样的“竞争”都是一个好现象，至少说明各地政府过去重视GDP，今天则比较重视居民工资收入。这有利于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居民工资增长上面，比如，加大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力度，扶持企业升级以增加职工工资等。

不过，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工资增长率有三个问题值得警惕：其一，有可能给工资数据“注水”。众所周知，很多年来各地披露的GDP数据加起来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就是“注水”。而且，统计数据造假案例已出现多起。既然GDP等数据可以造假，舆论关注的工资数据自然也有可能造假。

其二，人均工资数据有可能把外来工、临时工等人群排除在外。外来工、临时工为各个城市创造了价值，而在计算人均收入、人均GDP时却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现象早被舆论诟病。今天，也不排除某些地方为了追求漂亮的数据排除外来工。而临时工由于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是最容易被统计数据忽略的人群。

其三，人均工资掩盖了收入差距。尽管人均工资数据能看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工资水平，但却是宏观数据。而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各地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群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各地在公布人均工资数据时，还应该同时公布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工资数据。

土地不降价妨碍经济复苏

亚军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组，对北京、天津、河北等16个省（市）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了督促检查。督察组发现的问题中有一条非常关键：部分城市今年上半年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完成率较低，个别城市不到10%。

这一现象之前国土资源部也提到过，7月13日国土资源部公布上半年房地产用地供应情况时指出，上半年全国土地流标流拍总量较大，高溢价率宗地大幅减少。上半年房地产用地流标流拍1882宗，去年同期为1018宗。其中，商服用地流标流拍625宗，同比增加96.5%；住房用地流标流拍1257宗，同比增加79.6%。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土地购置面积降到历史新低。

我们从各地方的数据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7月份东莞市国土局挂牌上市共10宗用地，总面积为41.3万平方米，环比增幅高达304.37%。其中商住用地供应面积为26.12万平方米，环比增幅高达155.75%，但仅有3幅商住用地成交，成交面积为12 .04万平方米，占供应总量的46%。东莞只是冰山一角。根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在5月份的统计，截至5月21日，全国20个重点城市土地流拍宗数达到107宗，比去年同期增加三成。

卖地面积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地方土地收入急剧下降。财政部8月10日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1月~7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17967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620亿元，下降20.5%。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16214亿元，同比减少4729亿元，下降22.6%，主要是土地出让成交额大幅下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490亿元，同比减少5009亿元，下降27.1%。

而与之相反的是二季度以来全国房地产销售情况逐渐转暖，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出现连续反弹，销量逐渐升高，房价环比也在6月、7月企稳上涨，这正是国务院向各地派出八个督察组的背景。房产销售回暖，房地产开发商现金流比较充足，但为什么就不愿意像往年一样积极买地了呢？

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房地产销售上升将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对未来前景更加乐观，促使其向银行申请贷款买地建房，房地产投资就会跟着上升，但是在今年这一链条被打断，今年房地产销售的回暖更多是刚需在降息等政策推动下的释放，虽然投机成分仍然存在，但并不占主导。房地产开发商对前景的信心指数仍然不高，同时融资渠道依然被限制，资金来源同比增速只是刚刚企稳，所以房地产投资难以跟随销售上升而上升。

国房景气指数是房价、投资、销售综合指标，反映房地产市场整体景气度。目前销售回暖，房价小幅下跌，投资大幅下挫，几股力量导致国房景气指数大幅下降超过2009年最低值，其主要影响因素当然是投资的下降。也就是说，投资下降表明开发商信心不足，信心不足直接导致了投资下降。

在影响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信心诸多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上面并未提及：地价未下降。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年中的时候105个城市平均地价仍在上涨，这显然是和当前国内经济和房地产市场不相称的。地价的上涨导致房企购地意愿大幅下降，才发生了上述的土地流拍、购置面积创历史新低的现象。

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愿意降低地价呢？是因为担心会产生通缩–债务螺旋现象。地价下降会导致大量企业和商家资产价值缩水，贷款难以偿还，这将会导致进一步的收缩。在本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三角博弈中，地方政府仍然抱着救市幻想，但最受伤的却是自己。中央政府要求抑制房地产价格，房地产开发商选择了放弃投资，销售转暖使其能够继续存活，现金流压力不大，但由于房企投资减少，地方政府收入急剧减少，地方项目、保障房建设项目标等直接受土地出让收入影响的方面，受到冲击。正是由于价格不能完全市场化变动，土地市场无法实现出清，所以，国土部不得不下调今年的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由年初的17.26万公顷下降至15.93万公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并非按照市场经济的价格规律行动，而督查又未认识这一重要问题，并未纠正这种行为，因此，土地市场上的情况将会妨碍经济早日恢复上行。